



淮南子
(上)

新譯

行印局書民三 /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 譯注 匯禮熊
類 學 哲 / 閱校 慧迺侯

熊禮匯 注譯
侯迺慧 校閱

新 譯

淮

南

子

(上)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淮南子 / 熊禮匯注譯, 侯迺慧校閱. — 二版
一刷. — 臺北市: 三民, 2012
面; 公分. — (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78-957-14-5665-2 (上冊: 平裝)

ISBN 978-957-14-2553-5 (下冊: 平裝)

1. 淮南子 2. 注釋

122.21

101005856

© 新譯淮南子(上)

注譯者	熊禮匯
校閱者	侯迺慧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7年2月
	二版一刷 2012年4月
編號	S 0310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665-2 (上冊: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導 讀

《淮南子》即《淮南王書》。在漢代還沒有人稱它為子書，揚雄、劉向、高誘等人只稱它為《淮南》。《漢書·淮南王傳》稱它為《內書》，而《漢書·藝文志》則以《淮南內》著錄其中。至《西京雜記》，才說它「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卷三）。於是《隋書·經籍志》就以《淮南子》為名著錄其書。而它本名《鴻烈》，或稱《淮南鴻烈》。高誘釋謂「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淮南子敘目》）。《鴻烈》所明之道如何？是讀《淮南子》的人所關心的首要問題。本文即將《鴻烈》所明之道及相關之事，略述如次。

一、《淮南子》的作者、寫作背景和總體結構

(一)《淮南子》的作者

《淮南子》是由淮南王劉安組織他的一些門客編寫出來的。或如高誘所說，劉安「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同上）。「八公」「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是該書的主要撰寫人員，劉安為全書主編。或如梁啟超所說：「劉安博學能文，其書雖由蘇飛輩分纂，然宗旨及體例，計必先行規定，然後從事；或安自總導讀」

其成，亦未可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八公」「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為劉安之臣僚、門客，能文善辯自為其共同特點。具體材料，今存不多，考證繁瑣，故於此處略而不談。下面著重說說劉安的情況。

劉安是劉邦幼子劉長的大兒子，十六歲襲封淮南王。其「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漢書》本傳）。劉安善為文辭，文帝嘗命其作《離騷賦》（即《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高誘《敘目》）。這篇文章後來被太史公採入《屈原列傳》（自首句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皆是），在《史記》中，所用劉安文亦屬上乘之作。劉安為西漢前期詩賦大家，《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歌詩四篇」、「淮南君臣賦四十四篇」。除文學創作外，劉安還主編或撰寫了涉及其他學科的一些著作，諸如《淮南外》、《中篇》、《淮南雜子星》、《淮南萬畢術》、《淮南變化術》、《莊子略要》、《莊子後解》，以及《頌德》、《長安都國頌》等文。可惜的是上述著作和文章，除《淮南子》外，餘皆不存（《古文苑》收有劉安《屏風賦》，真偽待辨），但從這些記述也可想見劉安文才的富贍和學識的淵博。

說到劉安的家世，可以說是三代銜冤。

劉安之父劉長，是趙王張敖獻給劉邦的美女所生之子。趙相貫高謀殺劉邦事發，趙王等一千人被關進牢中，美人未能幸免，劉長便出生在獄中。美人之弟趙兼託辟陽侯審食其將其事報告呂后，呂后妒而不報劉邦。美人悲恨自殺，劉邦方命呂后收養劉長。大約在他兩歲時，封他為淮南王。文帝即位，劉長年約十九，常直呼文帝「大兄」。劉長「有材力，力扛鼎」，而母死之恨一日不忘，竟以「金錐」擊殺辟陽侯審食其。「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以此歸國益恣」（《漢書》本傳），於是引起文帝的猜忌。文帝即位六年（西元前一七四年），就以謀反罪將他流放蜀地，劉長剛烈，途中絕食而死。劉長死後，民間有歌謠說：「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迫於輿論，文帝

追尊諡其為厲王。

劉長死後十年，阜陵侯劉安得封淮南王。景帝三年（西元前一五四年），吳楚七國反，劉安未曾與亂。武帝即位，劉安對他懷有希望，初入朝即獻所作《鴻烈》。《漢書》本傳謂「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可是，好景不常，隨著武帝對諸侯王防範、制約、削弱措施的強化，武帝對劉安廣集賓客的疑懼不斷加深，朝廷一步一步構陷劉安，終以「謀反」罪名逼得劉安自剄，而其「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國除為九江郡」（《史記》本傳）。劉長、劉安、劉遷被誅，淮南國除，是文帝、景帝、武帝為鞏固中央集權，持續奉行削藩政策的必然結果。劉安能在《淮南子》中細論帝王之術，未必會明白他們三代被殺乃「勢」所致。

（二）《淮南子》的寫作背景

要弄清《淮南子》的寫作背景，必須了解武帝即位前歷代帝王遵循的政治路線，和為政治路線服務的思想主張。

在武帝即位前六十餘年中，歷代帝王大體上都執行了一條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最早是由高祖劉邦制定的。

劉邦一貫鄙薄儒生、絀斥儒學。當他平定天下，陸賈在他面前稱《詩》、《書》以論事時，他曾大罵對方，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後來他要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也不過是試一試，看他的主張是否合自己的心意。史載「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之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陸賈列傳》），陸賈成功了，他的主張不但合劉邦之心，還得到了包括蕭何、曹參、王陵、陳平等在內的左右大

臣的支持。那麼《新語》講些什麼呢？它講的不是純儒之道，而是以黃老道學為指導思想，講君主如何無為而治。所謂「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故無為也，乃無（不）為也」（《無為》）。還舉例說虞舜、周公「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而「天下治」。秦始皇則「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用刑太極故也」（同上）。還說君主當「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立，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道基》），又說「聖人不必同道」、「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思務》）。「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術事》），這不正是司馬談所說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史記·太史公自序》）的「道家」，實即黃老道學的治國之術嗎？因此，劉邦和左右大臣對《新語》的肯定，實際上是對與民休息、無為而治政治路線的肯定。

班固說：「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景帝紀》）漢興六十餘年，經濟發展、人丁興旺、國力強盛，出現了「文景之治」那樣的盛世景象，是自高祖以來幾代帝王實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政治路線的結果。而他們能做到無為而治，又與蕭何、曹參、陳平三位丞相和竇太后堅持遵循黃老之學的治國之道分不開。

蕭何服膺黃老之學，不僅以之束身修德，還能將其用於政事。他所主持制定的各種法令制度，皆能去秦政苛虐之弊、順民之情。《漢書·刑法志》言「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史記·蕭相國世家》言其「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要」，大體是不錯的。曹參相惠帝之前，嘗為齊丞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本傳》）。

曹參相惠帝一如相齊王時，「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嘗與惠帝言：「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當時百姓作歌，稱「蕭何為法，顚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故太史公謂「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本傳），又謂「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呂后本紀》）。剔除文中的誇張成分，太史公所說無為而治在惠帝、高后時所收到的社會效益是可信的。陳平相惠帝、文帝均用黃老之術，無為而為。為惠帝右相時，呂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為文帝左相時，一日文帝問右相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史記》本傳），其本黃老以治政對惠、文兩代帝王均有影響。從文帝開始，經過景帝，直到武帝即位之初，漢家都能堅持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治路線，竇太后起了很重要的維繫作用。竇氏為文帝后、景帝母，可以說是第一位忠實維護文帝路線、督導景帝、武帝實行文帝既定路線即以黃老之術治國的政治家。《史記》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外戚世家》），其實，她不只是要他們讀黃帝、老子書，而且要他們用黃老之術治國，如有違反，她就干預。比如武帝初即位，以儒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來朝。竇太后大怒，「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指武帝），上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資治

通鑑·漢紀九》。不但如此，欲倡儒術的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亦以疾歸」（同上）。而這件事就發生在劉安向武帝上《內篇》（即《淮南子》）的那一年。

綜觀漢代前期的思想界，不少思想家的著述似乎都在回答劉邦對陸賈的提問：秦何以亡？漢何以興？又何以長治久安？陸賈的《新語》、賈山的《至言》、賈誼的《新書》、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以及司馬遷的《史記》，無一例外。而這時黃老道學家（如蓋公等）傳播黃老道學，和社會上出現的許多黃老道學著作，從大的方面講，也是在回答劉邦的問題。《漢書·藝文志》著錄道家著作三十七種，其中大部分是黃老（託名黃老）著作。班固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此言頗能道出漢代前期許多黃老著作的實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內有《老子》甲卷本、乙卷本。乙卷本前抄有《經法》、《十六經》、《稱》及《道原》四篇古佚書。學者認為四篇古佚書即《漢書·藝文志》所錄之《黃帝四經》），便生動地反映出西漢前期黃老道學著作流傳的情況。當時流傳的還有《文子》等書。應該說，黃老道學著作的大量出現、傳播，既受到了歷代帝王無為而治的鼓舞，同時也為他們的無為而治提供了理論武器和治政之術。

從上面介紹的情況可以看出，從高祖到武帝即位之初，幾代帝王、賢相名臣都堅持了一條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治路線，並且獲得了成功。而在執行這條路線的過程中，執行者和反對者之間有過較量。君臣們應用黃老之術治身治國的過程，也是黃老道學不斷修正、完善的過程。漢初流行的黃老道學不能完全適應景帝以後的情況，它需要結合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經驗加以總結，這樣《淮南子》便應運而生了。

(三)《淮南子》的成書時間和作者的寫作動機

關於《淮南子》的成書時間，論者多言其大概。或謂「劉安招致賓客，大事著作，正在他二十七歲到四十歲之間這段年齡裡面」（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章），或謂「當在景、武之間」（吳光《黃老之學通論》第六章），或謂「查劉安入朝在建元二年，把這一年定為《淮南子》成書的年代是恰當的。當時劉安四十歲，他在自己封地上經營了幾十年，思想比較成熟，而且在學識上、資歷上具備了召集眾多賓客撰寫長篇的條件。從客觀條件看，自平息七國叛亂到建元二年這十多年間較為平靜，《淮南子》的寫作時間大約就是在這一時期的後半段，完成於劉安入朝前夕」（牟鐘鑑《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第二部分第一節）。

我認為《淮南子》的寫作時間是可以從書中所提供的材料考察出來的。《淮南子》〈齊俗〉中「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一段文字，抄自景帝二年（西前一五五年）夏四月所頒發的一道詔令。這說明《淮南子》，至少其中的〈齊俗〉寫作時間不會早於景帝二年夏四月。景帝於後元三年（西前一四一年）正月甲子日崩於未央宮，太子劉徹是日即皇帝位。而《淮南子》〈覽冥〉言「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云云，高誘注謂「天子，漢孝武皇帝」。據此，《淮南子》，至少〈覽冥〉的寫作時間不會早於後元三年正月。又卷二〈俶真〉說「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一椽，而輪之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通於天地之情也」，〈覽冥〉說「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止水」，〈泰族〉說「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

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書中一再貶斥申、韓、商鞅、張、蘇等人的主張，實是對武帝一項政令的讚許。史載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武帝紀》），據此，則《淮南子》，至少〈傲真〉、〈覽冥〉、〈泰族〉的寫作時間不會早於建元元年冬十月。劉安進京獻《淮南子》是在建元二年冬十月，自然書成於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因此，我認為《淮南子》的構思始於後元三年劉徹即位後，而正式動筆編寫則始於建元元年（西元前一四〇年）冬十月以後，在該年年底殺青。大約寫了十一個月。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劉安等人能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書稿，二是劉安為何要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寫出本書。關於前者，答案是肯定的。《淮南子》是劉安主編，由眾多作者編寫成的一本書，它是集黃老道學之大成，書中的許多觀點、材料乃至語句都是取自當時廣為傳播的黃老著作，劉安和他的寫作班子根據那些思想資料，聯繫漢代的實踐經驗作一些發揮在短期內編寫成一本書是不難的。何況他們人手眾多，都是一些文思敏捷、善為文辭的快手！關於後者，則牽涉到劉安寫《淮南子》的動機問題。

有人以為劉安修《鴻烈》以明道是為了和武帝崇儒對抗，並說這種思想上的對抗是和他後來政治上的謀反一脈相連的。此說大謬。前已言及，《淮南子》出現以前，黃老道學一直是在統治階層中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就在《淮南子》成書的第二年，竇太后還嚴懲了敢於背離黃老之學的丞相、太尉等人。竇太后歿於建元六年夏五月，直到元光元年（西元前一三四年）夏五月，武帝召集賢良對策，方有董仲舒、公孫弘出來倡言儒術，董氏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為武帝所採納。再者，也不能簡單地說《淮南子》就是反儒，相反地，倒是包容不少儒術在內，它是「采儒、墨之善」而用之。至於有人把劉安進《鴻烈》而武帝未用其術，說成是他後來「謀反」之因，更是無稽之談。一則二者絕無內在聯繫，二則「謀反」本是冤案。那麼劉安為何要在武帝即位之初寫這麼一本巨著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要通過總

結前代帝王用黃老之術治國的經驗，為新登基的年輕皇帝（劉徹十六歲登基）提供治身治國的方略，希望他繼續實行前代帝王恪守的政治路線。可以說，劉安的寫作動機，和竇太后督導劉徹讀黃老書而尊其術的願望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武帝能以黃老之術治身治國。所以書一寫好，他就將它獻給武帝。迫於景、武二代交替時的政治思想情勢，武帝見書，且「愛祕之」，對劉安亦禮遇有加。但武帝並不像他的前輩那樣篤信黃老道學，至多視其為百家之一言。不然，他就不會在收讀《淮南子》數年之後，還要對賢良文學之士說「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漢書·武帝紀》），和提出「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漢書·董仲舒傳》）的問題了。當然，這是後話。就劉安而言，作《鴻烈》的目的還是指望武帝能用其術，結果事與願違。這只說明他對經過文景之治以後，漢代社會必將有一個大發展，和這種大發展必將促使舊的政治思想發生變化以致為新的政治思想所替代這種大趨勢認識不深。

（四）《淮南子》的總體結構

《淮南子》有二十一卷。最後一卷〈要略〉是全書的序言，扼要地介紹了書的主旨、二十卷的內容、寫法以及各卷之間的聯繫。從〈要略〉可以看出，劉安組織蘇飛等人寫書，事先是有總體構想的。很可能各篇的立意、所要解決的問題以至表述方法都有謀劃，然後分頭執筆，最後由劉安加以潤色、定稿。梁啟超說：「觀〈要略〉所提挈各篇要點及排列次第，蓋匠心經營，極有倫脊，非漫然獮祭而已。」（《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是不錯的。

二十篇中，〈原道〉為首。〈原道〉闡述道的本質特徵，說明道為天地萬物之本。此篇為全書發明立言之本。〈俶真〉講天地萬物始於同一本原，因而皆具本原之性，而君主修身治世不能離本。〈天文〉講天地的由來、天體的運行規律，以及如何依據天象特徵以定歲時。〈墜形〉講赤縣神州的地理特徵、物產，以及不同的地理環境對人性、民俗的不同影響。〈時則〉講四時十二月的寒暑變化、動植物的生長

規律以及天子治國每月應該施行的政令。〈覽冥〉羅列眾多物類相感的現象，探討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精神〉講人保養精神的重要意義和如何保養其精神。〈本經〉講治國當去仁義禮樂而用道德，和聖人如何體道以治國。〈主術〉詳說君主治國的策略和方法。〈繆稱〉可謂道德仁義之散論，論其特點和彼此間的關係。〈齊俗〉論各地禮俗的獨特意義及相等的存在價值。〈道應〉以「已然之事」印證黃老道論之言。〈汜論〉以道為準，汜論「世曲（世上瑣事）」。「詮言」以人事為例，解說何謂君主治國之根本。〈兵略〉論軍事問題。〈說山〉以道論為指導思想，解說眾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說林〉重在揭示萬事萬物之理，而以道論為歸。〈人間〉通過分析眾多人間之事，說明禍與福、利與害、得與失之間相互轉化的道理。〈脩務〉論「無為」特徵和求學之事。〈泰族〉講君主修身治政之術。或謂此為全書之總結。從各篇內容可以看出，《淮南子》涉及知識面極廣，可謂漢初文化思想之百科全書。前人稱其為雜家著作，實如高誘所言：「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燹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事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敘目〉）

為什麼書中涉及這麼多門類的知識呢？是因為本書的主題就是講本於黃老道學的帝王之道。「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陸賈《新語·明誠》），舉凡天道、地道、人道不可不知，不然何以法天地、體道德？本書各篇所言都圍繞同一主題，篇篇皆有用意。如設〈天文〉為的是使君主「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設〈時則〉為的是「使君人者所以從事」。從全書結構來看，〈主術〉以前為一大截，總論道的特點而及天道、地道、人道和帝王之術，後一截則分論眾多具體問題。最後由〈泰族〉對全書作出總結。至於各篇的排列順序亦有講究，直如〈要略〉所言：

故言道（《原道》）而不明終始（《俶真》），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天文》）和《墜形》）四時（《時則》），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覽冥》），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精神》），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本經》），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主術》），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繆稱》），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齊俗》），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道應》），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汜論》），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兵略》），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說山》）和《說林》），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泰族》）。

《淮南子》各篇之間的聯繫未必如此緊密，各篇內容未必如此單一，但文中把各篇內容納入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理出它們之間整然不亂的秩序，並指明這樣來結構其書的目的是究天地之理、接人間之事、備帝王之道，對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全書的立意和構架形式是有幫助的。

二、《淮南子》所說之「道」和道論的實質

「道」是黃老道學最重要的哲學概念。《淮南子》說天地之理、人間之事、帝王之道，既以「道」為出發點，又以「道」為歸宿。「道」是全書立論的理論核心，故書中言及「道」者甚多。略事歸納，《淮南子》所講的「道」有下面一些特性。

（一）「道」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

書中說：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恆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原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裡，洞同覆載而無所礙。

（《繆稱》）

「道」又稱為「一」，為萬物之本，為「物物者」，因此它存在於一切時間、空間、一切事物之中。所謂「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原道》）。「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幽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同上）。

（二）「道」無形無象，不可度量，不可言說

書中說：

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

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若無而有，若亡

而存。(《原道》)

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繆稱》)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形之不形者乎？」

(《道應》)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兵略》)

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齊俗》)

無形無象既是對「道」作為萬物本體的形態的形容，所謂「大道無形」(《詮言》)、「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原道》)。高誘注《原道》即謂「無形，道也」，也是對作為萬物生長規律的「道」作用於萬物的方式的形容。「不可度量」是指「道」的無所不能而言，如「道」之「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舒之天下而不窺，內之尋常而不塞」(《汜論》)等，所謂「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劫迫也，不可量度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兵略》)、「不可言傳」，則兼指二者而言。

(三)道生萬物，而有「神明」之功

書中說：

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本經》)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原道》)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於一父母而閱一和也。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蘗，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授焉。無不授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莖，遼巢彭薄而為雨，沉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儗真》）

文中講萬物同生於道，道為「授者」，萬物為「受者」。道如何生萬物，〈天文〉中說：「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道生萬物並非有意而為，所謂「太上之道，生萬物而無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原道〉）。道之生物亦如道之作用於物，「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儗真〉），所謂「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此之謂神明」（〈泰族〉）。那麼道生萬物後到哪裡去了呢？「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詮言〉）。而且萬物消亡，道仍存在，也就是說，道具有不生不死的特性，所謂「夫生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儗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精神〉）。

（四）「無為者，道之宗」

書中講「道」的無為常常兼及「德」。無為為道的特性，亦為「德」的特性。因為「德」為「道」之殊稱，相對而言有分別，統而言之則合而為一，〈覽冥〉謂「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疏」。本書有分言道德者，如〈繆稱〉說「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是把物所共同遵循的規律稱為道，而把個別事物遵循共同規律而具有的特殊性稱為德。而〈原道〉謂「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齊俗〉謂「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雖是分言道德，而所說